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語言文獻研究

黃征 著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語言文獻研究

黃征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語言文獻研究/黃征著.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3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柴劍虹,張涌泉,劉進寶主編)
ISBN 978-7-308-15409-3

I. ①敦… II. ①黃… III. ①敦煌學—語言學—研究 ②敦煌學—文獻—研究 IV. ①H1 ②K87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01907 號

敦煌語言文獻研究

黃 征 著

-
- 出品人 魯東明
總編輯 袁亞春
叢書策劃 黃寶忠 宋旭華
責任編輯 張小苹
責任校對 周晶晶
封面設計 項夢怡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天一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12.625
字 數 305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8-15409-3
定 價 36.00 圓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中心郵購電話(0571)88925591;<http://zjdxcs.tmall>.

浙江大學文科高水平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

資助

[浙江大學“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柴劍虹 張涌泉 劉進寶（執行）

編 委 （按姓氏筆劃排序）

王惠民 施新榮 柴劍虹 張先堂 張涌泉* 許建平

馮培紅 趙聲良 劉 波 劉進寶 盧向前

（加*者是本冊責任編委）

總序

浙江，我國“自古繁華”的“東南形勝”之區，名聞遐邇的中國絲綢故鄉；敦煌，從漢武帝時張騫鑿空西域之後，便成為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會”。自唐代始，浙江又因絲綢經海上運輸日本，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之一。浙江與敦煌、浙江與絲綢之路因絲綢結緣，更由於近代一大批浙江學人對敦煌文化與絲綢之路的研究、傳播、弘揚而令學界矚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榮昌盛，學術底蘊深厚，在時代進步的大潮流中，涌現出衆多追求舊學新知、西學中用的“弄潮兒”。20世紀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流散而興起的“敦煌學”，成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中國學者首先“預流”者，即是浙江的羅振玉與王國維。兩位國學大師“導夫先路”，幾代浙江學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奮隨其後，薪火相傳，從趙萬里、姜亮夫、夏鼐、張其昀、常書鴻等前輩大家，到王仲華、潘絮茲、蔣禮鴻、王伯敏、常沙娜、樊錦詩、郭在貽、項楚、黃時鑒、施萍婷、齊陳駿、黃永武、朱雷等著名專家，再到徐文堪、柴劍虹、盧向前、吳麗娛、張涌泉、王勇、黃征、劉進寶、趙豐、王惠民、許建平以及馮培紅、余欣、竇懷永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學術追求，也有各自的學術傳承與治學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學科園地辛勤耕耘，為國際“顯學”敦煌學的發展與絲路文化的發揚光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浙江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者，成為國際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研究領域舉世矚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學術群體。這在近代中國的學術史上，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始創於1897年的浙江大學，不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淵藪，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英才輩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貫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腳踏實地而又敢於創新的學者專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的浙江學人而言，不僅相當一部分人的學習、工作與浙江大學關係緊密，而且每每成為浙江大學和全國乃至國外其他高校、研究機構連結之紐帶、橋梁。如姜亮夫教授創辦的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1984年受教育部委託，即在全國率先舉辦敦煌學講習班，培養了一批敦煌學研究骨幹；本校三代學者對敦煌寫本語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獻的分類整理，在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浙江大學與敦煌研究院精誠合作，在運用當代信息技術為敦煌石窟藝術的鑒賞、保護、修復、研究及再創造上，不斷攻堅克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原語言文學分會基礎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也已經成為與甘肅敦煌學學會、新疆吐魯番學會鼎足而立的重要學術平臺。由浙江大學學者參與主編，同浙江圖書館、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編撰的《浙藏敦煌文獻》於21世紀伊始出版，則在國內散藏敦煌寫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領跑與促進的作用。浙江學者倡導的中日韓“書籍之路”研究，大大豐富了海上絲路的文化內涵，也拓展了絲路文化研究的視野。位於西子湖畔的中國絲

網博物館，則因其獨特的絲綢文物考析及工藝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優勢，並以它與國內外衆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機構進行實質性合作取得的豐碩成果而享譽學界。

現在，我國正處於實施“一帶一路”偉大戰略的起步階段，加大研究、傳播絲綢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應有之義。這對於今天的浙江學人和浙江大學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學術積累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傳承、發揚學術優勢的問題，也是以更開闊的胸懷與長遠的眼光承擔的系統工程，而決非“應景”“趕時髦”之舉。近期，浙江大學創建“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舉辦“絲路文明傳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邁出的堅實步伐。現在，浙江大學組織出版這一套學術書系，正是爲了珍惜與把握歷史機遇，更好地回顧浙江學人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歷程，奉獻資料，追本溯源，檢閱成果，總結經驗，推進交流，加強互鑒，認清歷史使命，展現燦爛前景。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編委會

2015年9月3日

出版說明

本書系所選輯的論著寫作時間跨度較長，涉及學科範圍較廣，引述歷史典籍版本較複雜，作者行文風格各異，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歷史、尊敬作者、遵循學術規範、宣導文化多元化的原則，經與浙江大學出版社協商，書系編委會對本書系的文字編輯加工處理特做以下說明：

一、因內容需要，書系中若干卷採用繁體字排印；簡體字各卷中某些引文為避免產生歧義或詮釋之必需，保留個別繁體字、異體字。

二、編輯在審讀加工中，只對原著中明確的訛誤錯漏做改動補正，對具有時代風貌、作者遣詞造句習慣等特徵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歷史地名、族名等稱呼，只要不存在原則性錯誤，一般不予改動。

三、對著作中引述的歷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處明確，核對無誤，原則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動。原著沒有注明版本出處的，根據學術規範要求請作者或選編者儘量予以補注。

四、對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魯番所出古寫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規範簡體字或繁體字，如因論述需要，也適當保留了一些原寫本中的通假字、俗寫字、異體字、借字等。

五、對著作中涉及的書名、地名、敦煌吐魯番寫本編號、石窟名稱與序次、研究機構名稱及人名，原則上要求全卷統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體現時代特色或學術變遷的，可括注說明；無法做到全卷統一的則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書系編委會

目 錄

我與敦煌學	(1)
敦煌寫本整理應遵循的原則	(9)
敦煌寫本異文綜析	(25)
敦煌變文釋詞	(48)
敦煌俗語詞輯釋	(63)
敦煌俗語詞小札	(77)
《壇經校釋》釋詞商補	(81)
魏晉南北朝俗語詞考釋	(89)
魏晉南北朝俗語詞輯釋	(103)
釋“接”	(110)
《搜神記》釋詞	(113)
“踏破賀蘭山缺”	
——近代漢語中的一種特殊句式 VC_1+N+C_2	(122)
三字連文論析	(125)
敦煌俗音考辨	(129)
王梵志詩校釋研究綜述	(139)
王梵志詩校釋商補	(146)
王梵志詩校釋續商補	(162)
《王梵志詩校輯》商補	(194)
王梵志詩校釋補議	(226)
《敦煌歌辭總編》校釋商榷	(249)

《敦煌歌辭總編》評議	(272)
輯注本《啟顏錄》匡補	(283)
《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匡補	(306)
浙江敦煌學研究綜述(1909—1990)	(327)
敦煌文獻中有浙江文化史的資料	(343)
敦煌語言文學研究者的一次興會	
——1988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術討論會側記	(352)
有關“敦煌學三書”的撰著情況	(357)
貴在有所發明	
——蔣禮鴻先生的精品意識	(365)
徐復先生對俗語詞研究的貢獻	(372)
板凳甘坐十年冷 文章不着一字空	
——郭在貽先生評傳	(375)
後 記	(387)

我與敦煌學

我與敦煌學，如果要追溯源頭，那要回到 1980 年秋我在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本科的時候。我是杭師院第一屆本科生，當時教學條件很差，我們經常搬個椅子到農田裏看書，圖書館也沒有幾本可看的書。我大學一年級是做作家夢，但是看了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後覺得自己也屬於不適合詞章的人，於是就開始轉入研究。先是對現代文學感興趣，《新文學史料》每期必買，魯迅雜文反復研讀。可是大二之後，我的學術興趣從現代文學轉到了古典文學，也就是我考上大學之前最喜歡的唐宋詩詞之類，而當時張錫厚先生的《敦煌文學》小冊子剛出版不久，我就買了一本坐在一間朝北的我稱之為“北斗居”的宿舍床頭閱讀，感覺非常新鮮有趣。這是我最早受到的敦煌學啟蒙吧，當時怎麼也想不到後來竟一輩子從事敦煌學研究了。與此同時，為了彌補學校圖書少的缺陷，我在中文系開了介紹信，經常騎半小時自行車到西湖孤山的浙江圖書館古籍部閱讀古書，那裏的圖書管理員老朱師傅、陳華師傅不厭其煩地為我把一摞摞的綫裝書搬進搬出，諸如許國霖《敦煌雜錄》、劉復《敦煌掇瑣》、羅振玉《敦煌零拾》等，以及繁體豎排的新古籍如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敦煌曲校錄》之類，都是在那裏才有機會閱讀的。我一邊閱讀，一邊翻卡片櫃目錄，把想讀的書都做了詳細的分類目錄，逐漸形成了學科體系的基本概念。當時讀的書其實目標不是很明確，有感興趣的就借出來翻閱，多半屬於瀏覽。不過敦煌的材料，尤其

是敦煌曲子詞的校勘解讀，我完整抄錄了好幾種，包括朱祖謀《彊村叢書·雲謠集》、冒廣生《新輯雲謠集雜曲子》等，手抄本現在還保存着。我在孤山古籍部還遇到了現在已故的陳植鏗先生，當時他正在撰寫碩士論文，他問我看古書想做什麼，我說主要是感興趣而已，準備寫一篇《六言詩初探》。於是他建議我考研，介紹我去找錢志熙，說錢志熙剛考取研究生，有考研經驗，我可以去跟他聊聊。這樣我後來與錢志熙（現任北京大學教授）成為朋友，幾年後經過努力也考上了杭州大學研究生。

我 1985 年秋考入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班，同班七人，包括任平、王定煥、金永平、丁興根、鄭萬青、許建平和。當時讀書很清苦，尤其古典文獻學，我們進門第一堂課，沈文倬先生就說做這個學問發不了財，但也餓不死，基本上靠國家養着，要耐得住寂寞。果然，有的同學覺得學這個沒用，後來做了報社記者，還有的則改行當了律師。不過我一直頂着家庭壓力，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從未動搖。我覺得有那麼好的導師條件，不多學點學問，實在太可惜了。我在 1986 年的時候，因為聽了郭在貽先生的訓詁學課和《說文解字》課，開始比較多接觸敦煌文獻語言材料，做起了敦煌曲子詞、王梵志詩和變文的俗字、俗語詞研究，並到郭先生家裏單獨求教。郭先生給了我許多鼓勵和指導，我當時寫的每一篇論文都經過郭先生的批改審訂，所謂“金針度人”，衣鉢傳授，終身難忘。1987 年春，在郭先生家裏我見到了師兄張涌泉，當時張師兄正與郭先生商量合作校勘《敦煌變文集》的科研計劃，張師兄提議可以與我一起在郭先生指導下來做這個合作項目。郭先生很高興，覺得這個合作團隊會很強。其實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我們將進行一場上規模的合作研究，我也才第一次與張涌泉師兄見面談論。我不知道他從哪里聽說我的研學狀況，也許是從同學那裏，也許是從郭先生那裏，反正第一次見面他

就認為我跟他合作能行，他說此前與一位女同學合作比較費勁。郭先生與張師兄都是急性子，在他們的帶領下，我也慢慢加快了步伐。就在1987年這一年，中國訓詁學會在富陽舉行大會，會上王鎮教授提議重新校對整理《敦煌變文集》，出版一個新本子，並且認為我們的三人組合是最強的。於是我們正式提出了“敦煌學三書”的計劃，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快馬加鞭研究起來。由於專心做學問，我畢業工作都沒有去找，後來郭先生說不要找了，他建議我留校到中文系古漢語古典文獻教研室任教。就這樣，我成了郭先生與張師兄的同事，合作團隊更加緊密，閱讀敦煌寫本縮微膠卷並撰寫校釋論文的速度快得驚人，以至於季羨林先生也很快看到我們的成果。1990年在北京舉行敦煌學研討會，我與季羨林先生都在語言組討論，當我讀完論文的時候，季老拿着我手寫複印的論文問我：“你就是黃征啊？怎麼是個小伙子，看論文我還以為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先生，心裏奇怪怎麼還有我不認識的老先生呢？”原來我們那時候寫論文都跟導師學習，文章用的是淺白文言，老氣橫秋，看不出是年輕人寫的。季先生還對我畢恭畢敬書寫的論文字體大為稱讚，他說這真是你手寫的嗎？像是印出來的差不多。不僅季羨林先生給我們很多鼓勵和獎掖，其他老先生也都對我們坐冷板凳的精神多有褒獎。記得2000年的夏天，饒宗頤先生路過杭州，通過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毛昭晰教授找到我，說到了杭州，就想見兒幾個人，其中敦煌學方面的就有我。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饒宗頤先生，此前他主編的新文豐出版公司的《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邀請我出過一本《敦煌語文叢說》，書名是饒先生親自改定的，《序言》是他親筆書寫的（我保存了影印件）。他在《序言》裏有對我的評價，也說了他與我導師姜亮夫、蔣禮鴻和郭在貽先生的情誼。

我的寫作，能夠稱得上“文章”的，大概可以分類如下：一是詩

詞、散文，主要創作於中學畢業到上大學之際，或賦閑情，或抒忿懣，後來也偶一爲之，總數勉強可以“編爲三卷”，留着晚年再來收拾；二是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研究論文，主要是大學期間所作，發表了一半，例如我的論著目錄中的《六言詩初探》^①、《絕妙佳詞〈採蓮曲〉》^②、《蘇軾〈山村五絕〉及其它》^③等，未刊的有邊塞詩討論、魯迅雜文探微之類；三是訓詁校勘學論文，是碩士研究生期間才開始寫的論文類型，例如《“燭火不息”解》^④、《“踏破賀蘭山缺”句法解》^⑤、《“攝弊衣冠”的“攝”》^⑥、《釋“減”“僅”》^⑦等，此後也不斷有些發表；四是敦煌俗文學作品與俗字、俗語詞、俗音等的專題研究，是在1986年（碩士生的第二年）跟隨郭在貽先生研習訓詁學、敦煌語言文字學後開始寫的，《敦煌陳寫本晉竺法護譯〈佛說生經〉校釋》、《敦煌文學〈兒郎偉〉輯錄校注》、《〈王梵志詩校輯〉商補》、《王梵志詩校釋商補》等一批論文像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這第四類的論文，可以說是一發而不可收，年年有餘，以至於今。我一直認爲我們古典文獻專業的研究生，論文品質是比較上乘的，大多言之有物，而且實際投入的精力比許多學科的要多。可是我們一開始往往很不自信。我在第一次見郭在貽先生時就很不自信，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做訓詁學研究會有成就嗎？”因爲我本科畢業於師範學院，研究生讀的是研究生班（兩年制），感覺比別人差一截。沒有想到郭先生平時話不多，這次却足足花費了半個小時來打消

① 《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

② 《詞刊》1983年第3期。

③ 《杭州師範學院83屆畢業論文選》。

④ 《社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5期。

⑤ 《文學遺產》1987年第2期。

⑥ 《中國語文天地》1988年第3期。

⑦ 《文史》1988年第31輯。

我的自卑和疑慮，使我一下子“長高了”許多。在後來的歲月裏，我一直很有信心，也很努力，眼看着從許多同學、同事身邊走過，趕在了他們的前面。所以我至今念念不忘我的導師郭在貽先生，是他真正把我帶上了學術之路。我還記得 1988 年郭在貽師特別告誡我：“不要只成個敦煌學家。”我體會那意思，是要我不忘訓詁校勘學的老本行，敦煌學對我而言只是跟訓詁校勘學相關聯的學科。後來我一直遵循這個原則，即以訓詁校勘學為根底，去研究、解決敦煌文獻中的問題。事實上也證明，從敦煌學到敦煌學是很容易流於膚淺的，研究者應該各自以本專業的優勢來鑽研敦煌學，使敦煌學的發展不斷向縱深發展，同時也不斷拓寬其研究領域。

說到我的老師，我真覺得很幸運。在本科階段，後二年我特別喜歡古典文學，杭州師範學院的樊維剛、羅仲鼎先生給了我很多的指點，並且也使我逐漸留意訓詁知識。1985 年進入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由於是個七個人的班，而且學制二年，導師不固定，所以第一年全靠自己摸索。不過我也因此感到很幸運：姜亮夫先生是我們的掛名導師，沈文倬、劉操南、龔延明、郭在貽、張金泉等都是我們的任課教師，而且還邀請了數學、建築學專家沈康身先生給我們上古典建築史，不僅很開眼界，而且結識了比別人多的老師。我們的畢業論文指導，是由自己選擇導師的，我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郭在貽先生指導，所以真正給我直接指導的是郭在貽先生。當然我也廣泛鑽研其他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姜亮夫、蔣禮鴻先生的著作，他們都是敦煌學的著名專家，也都是文字、音韻、訓詁學家，而且還都是書法家。兩年學習後我順利畢業，並且在郭在貽先生的推薦下留校到中文系工作，第三年在工作崗位上通過論文答辯（當時對研究生班的特殊規定）。1989 年郭在貽先生因病去世。1990 年，我在沒有人願意讀博士學位的情況下，考取蔣禮鴻先生指導的漢語史訓詁學方向博士生。因